

新疆和平解放后，麦斯武德在新疆大肆推行泛突厥主义的罪恶行径还没有得到清算时，他便于 1950 年去世了，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新疆历史词典》给麦斯武德的定论是“（民国）三十六年，继任省政府主席，重用泛突厥主义分子，反共、反苏并以‘高度自治’为名妄图分裂国家的统一遭到各族人民和上层有识之士的普遍反对，次年年底卸任省主席任。勾结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破坏和平起义，分裂祖国统一。1950 年 4 月被捕，死于狱中。”享年 63 岁。

2017 年 7 月 1 日

历史回声：有读者留言，也是作者发文时校对不清，上集中有关麦斯武德系玉山巴依弟弟的儿子，表述前后不一致，特此致歉！也有读者留言说，“麦斯武德并非玉山巴依弟弟的儿子，而是萨比尔阿吉的儿子”。作者又问他萨比尔阿吉的简历资料，他说在维吾尔文的历史资料上有记载，所以暂时没有翻译的新资料，只能维持现状了，留待后面有机会再统一修改吧！再次鸣谢支持！

2018 年 10 月 22 日

【网络文章：新疆人物】

包尔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¹

杜雪巍²

1989 年 8 月 27 日，曾任过中华民国新疆最后一任省政府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第一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包尔汉·沙希迪，在北京全国政协副主席任上去世了，享年 95 岁。包尔汉·沙希迪的离世，给新疆原本硕果累累的季节凭添了一抹初秋的肃杀。

包尔汉老人走了，一个目睹了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后两个时代风雨沧桑七十七年来变迁的老人走了；一个流落异国 18 个年头满腔热诚挚爱祖国的游子情怀缱绻给了我们。

1949 年 1 月 10 日，包尔汉·沙希迪正式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在张治中的安排下，包尔汉双手接过满目疮痍的新疆这幅烂摊子，将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新疆和缓平稳地带入了一个新的世界。1949 年 9 月 26 日，“包尔汉与陶峙岳将军一起，响应中共中央号召，毅然决然地脱离国民党政府先后通电起义，实现了新疆的和平解放，并担任了新疆省人民政府第一任主席。”包尔汉使新疆免受战火的洗礼而由国民党执政时期快速更迭为共产党执政时期的和平使者。他是新疆这种历史大变局当中的参与者与见证者。

一、归来

包尔汉·沙希迪（1894-1989），光绪二十年（1894 年）10 月 3 日，出生在俄国喀山省特铁什县一个名叫阿克苏的小村庄。幼年时，他的爷爷郭拜都拉便告诉他：“我们的故乡是在遥远的中国。那里一条大河叫阿克苏河，那才是真正的阿克苏呢！”

包尔汉的爷爷郭拜都拉的爷爷帕拉提，曾生活在中国新疆的阿克苏河畔，因反抗巴依的残酷压榨和剥削，便带领 20 多户村民逃到了俄国伏尔加河畔。这里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于是，

¹ <https://mp.weixin.qq.com/s/3xd5qpGlpqMbLupgH9pgWw>

² 作者为《新疆文史》执行副主编，执行总编辑。



俄国便把这些从中国新疆逃难的人们集中送到了特铁什县境内，开荒种地。他们在这里伐木、种地，为了纪念他们心中的故乡，便把这片新开垦的居民区起名叫做“森林阿克苏”。

终生没有读过书而知道辛勤劳作的郭拜都拉满腔希望包尔汉能够到学校读书。但当时，包尔汉一家8口人全靠父母亲的操劳奔波养活，实在没有多余的钱来供包尔汉读书。好在包尔汉的姑父在邻村教授经文课，于是在包尔汉爷爷的恳求下，包尔汉的姑父终于答应了他可以到那里学习，但必须要在哪里兼职烧茶水，才可以免去学费。包尔汉兴高采烈地去那里上学，但是还不到一年，包尔汉的爷爷便去世了。他的父亲认为上学读书没有用，包尔汉也就辍学在家。但是在包尔汉的脑子里，始终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上学，长大以后到中国去。

包尔汉整天闷闷不乐，忧心忡忡的样子，吓坏了淳朴善良的母亲。在母亲的一再追问下，包尔汉便说：“我想去上学，我想去读书！”

包尔汉知道，自己有个在喀山做面粉生意的舅舅，就说，“让我到舅舅那里去读书吧？”

母亲望着儿子那期待的眼神，不愿意再伤儿子的心。为了避免父亲的反对，母亲趁丈夫外出去买胡萝卜的间隙，让包尔汉跟随村里的一位邻居大叔去了喀山。

舅舅、舅妈知道了包尔汉的来意后，很高兴地就把他送到附近的一个名叫穆罕德亚的学校去读书。在学校里，包尔汉被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所驱使，尽情地学习着五花八门的知识。然而好景不长，因为舅舅的生意亏本，无力再供应包尔汉上学读书了。

宣统二年（1910年）春，已经16岁的包尔汉被舅舅介绍到一家书店去做学徒。在书店，包尔汉要负责店堂的卫生打扫、书籍的包扎邮寄。到了晚上，包尔汉还要给老板打扫房间，给孩子洗衣服。尽管工作很辛苦，但包尔汉却感到非常快乐，因为书店有很多书籍可以阅读。包尔汉不仅利用闲暇时间阅读了大量的俄罗斯文学名著，而且他还学会了俄文，知道了外面还有一个纷繁广阔的世界。

包尔汉在这家书店工作了两年多时间，结识了一位经常来买书的司马义·阿吉老人。老人告诉包尔汉说，他家住在斜米，经营着不少商行，有几个还正好在中国，很想找个愿意去中国工作的年轻人。当听到可以到中国去工作，让包尔汉怦然心动。这让他顿时就想起了爷爷告诉过他的，那里就是自己的故乡。

经过仔细了解和慎重考虑，包尔汉决定毛遂自荐到司马义·阿吉那里去工作。没过几天，当老人再次来到书店时，包尔汉便告诉来说，那个愿意到中国工作的年轻人找到了，那个人就是我。

经过了解，司马义·阿吉老人知道了包尔汉不仅会俄语，还会财会，所以他当即拍板，以每月20卢布的薪资雇佣了他。

包尔汉在斜米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在1912年冬天便被派往新疆迪化的天兴行去工作。包尔汉跟着经理从斜米出发，先坐火车到阿亚古斯，再乘马车，直奔中国塔城的巴克图口岸。他们一行先在老塔城住了一夜，清晨，包尔汉便登上塔尔巴哈台山上，眺望着眼前的河流、草原和湖泊，心潮起伏。这就是爷爷曾经一次次念叨过的祖国——中国。自己终于回到了昔日思夜想的故乡——祖国。

民国元年（1912年）9月，经过10多天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新疆省府迪化。这一年，包尔汉到天兴行工作时，年仅18岁。

民国三年（1914年），包尔汉在踏上梦寐以求的祖国的土地之后，便向中国政府提出申请，要求恢复自己的中国国籍。当时在新疆，拥有俄国国籍的人享有诸如经商不纳税等许多特权。闻听包尔汉要放弃俄国国籍，就劝他说要谨慎。但包尔汉坚决地说，“我早就想好了，我就是要做一个中国人！”

民国二十年（1922年），他又将父母和两个妹妹接来迪化定居。从此，包尔汉他们一家人终



于在自己的祖国安顿下来。尽管当时他们的生活还不是很富裕，但结束了异国漂泊的日子，让他们心中觉得异常坦然。

二、初到新疆

“我到乌鲁木齐的那一年（1913）”，当时辛亥革命才刚刚过去一年，包尔汉还在司马义阿吉的天兴贸易行工作，但他目睹了英俄帝国主义依据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人民进行的欺压和剥削。大批俄商经营着进出口贸易均不纳一分钱税额，而且他们还时常包庇一些不法的中国商人冒充俄商偷税、逃税。“新疆对帝俄的贸易总额，输出为九百八十万卢布，输入为八百四十万卢布。”

那时候，类似天兴行的俄国商人开的贸易行在迪化有八家，均在迪化贸易圈经营。贸易圈“北起皇城巷，南至三甬阜，东达义冢，西尽西河坝”。《新疆图志》中关于乌鲁木齐的贸易圈是这样记载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划贸易圈于迪化，是三道桥南官大路东西两段地方。”这些洋行进口以布匹、铁、砖茶、红糖、棉线、石油、纸烟、火柴及其他日用品为主，出口货物以牲畜、羊毛、羊皮、羊肠、棉花、干货、兽皮等为主。“其中最大的是塔塔尔人胡赛因、哈桑兄弟等的吉祥涌；其次是塔塔尔人依斯哈克兄弟等的天兴行，乌兹别克人伊敏江、吐尔逊巴巴的德盛行，乌兹别克人美尔沙里、拉合满巴依德和行；再次是乌兹别克人满素尔江的吉利行，乌兹别克人塔居斯曼的仁中信行，塔塔尔人孜牙巴依的芝盛行，乌兹别克人阿布特的茂盛行。”

包尔汉亲眼目睹了新疆民族那些手工业者是怎样在帝俄商人洋货充斥下被挤垮的。这些外国洋行不但把持着新疆的商业，还强行霸占着水草丰美的牧场，严重损害着中国的主权。

包尔汉在天兴行前后工作了八年。他渴望有一天能够报效祖国，所以他利用一切机会努力学习说汉语、写汉字。包尔汉也常常找机会与汉族人接触，接触中学习说汉语、写汉字。如此循环往复，八年下来，包尔汉的汉语水平已经相当熟练。包尔汉酷爱学习的热情，天兴行的老板均看在了眼里，所以每每遇到与汉族官员交往，都会拉上包尔汉做翻译。这种工作反过来又方便了包尔汉学习和掌握汉语，使他受益匪浅。

说起包尔汉与新疆汉族官员交往，还有一个小插曲。那便是从内地取道西伯利亚赴新疆的樊耀南乘火车走到斜米时，旅资告罄，遂求助于恰好在新疆经营贸易的斜米商人依斯哈克。依斯哈克不仅借旅资给了樊耀南，还派人将其一路护送到了塔城。樊耀南到达乌鲁木齐后，很快就任新疆法政学堂的教员兼迪化地方审判厅厅长一职。民国七年（1919年）以后，依斯哈克一家迁居新疆乌鲁木齐。樊耀南也不忘旧谊，时常与依斯哈克来往。而樊耀南每次与依斯哈克见面，均由包尔汉做翻译。一来二去，包尔汉便与樊耀南熟悉了起来，且通过樊耀南，包尔汉也认识了新疆的很多汉族官员。由此，不仅包尔汉的汉语水平突飞猛进，汉文功底也日渐厚实，他也渐渐明白了“国家前途和民族平等的道理”。

民国八年（1920年）以后，苏俄政权逐步稳定了下来，也遂即恢复了与新疆的各项贸易。为加强对贸易的官理，新疆政府决定成立关税局。在华俄道胜银行做翻译的潘祖焕，便找到与其交好的包尔汉，告知了他新疆关税局正在招兵买马的消息。早就打算为中国效力的包尔汉非常兴奋，然后潘祖焕便将通晓汉、俄、维三种语言的包尔汉推荐给了父亲新疆财政厅长潘震。潘震也很希望能找到像包尔汉这样的人，来充实关税局。

包尔汉面见潘厅长以后，答应到关税局来做事。经与天兴行的经理依斯哈克商议，包尔汉得以不辞去天兴行的工作，另外又兼了一个关税局的差事。这也便成为了包尔汉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

三、踏入政界



民国九年（1921年），塔城发生了关税舞弊案，包尔汉与同僚侯庚炆奉命前去调查。出发前，杨增新接见了他们，严肃地说：“此事干系重大，一定要查清楚，否则此风一开，后果不堪设想，如有必要，可以到苏联去查账。”

包尔汉等在塔城住了三个月，查出了一起私扣税金高达17600两白银的大案。依照当时的法律，贪污500两便可杀头。而塔城道尹又恰是杨增新的亲信张键。若据实报告，张键必然没有好结果。张键见事情败露，便把侯庚炆找去，准备赠送白银2640两将此事掩盖过去。侯庚炆遂与包尔汉商议，包尔汉坚决不答应。

但如果据实报告，必然得罪一批塔城官员，杨增新也未必高兴。最后，他们决定采取折中的方式，把事实报告给杨增新，外加一个说明，即税金收齐后，还未对完账，所以未及时上交。张键的贿赂，他们没有收，贪污的事情也掩盖了过去。

事后，包尔汉拒绝贿赂的事情传到了杨增新的耳朵里，也进一步增加杨增新对他的信任。此后潘震去世，给其送3000元慰问金，且为笼络樊耀南而送其一万两省币，杨增新均委托包尔汉去办理。

民国十年（1922年），杨增新委派包尔汉去负责马场的工作。杨增新准备筹备新疆的交通运输业。而在此前，新疆交通运输也全靠马匹，省政府还设有专门的马场。马场养有2000多匹马，包尔汉是边学边干，耗费了大量精力。由此，包尔汉辞去了天兴行的工作，转而集中精力来做新疆政府的事情。

踏入政界以后，包尔汉深感当时政治的诸多黑暗，非常失望且为新疆的前景担忧。加之他先前便与樊耀南熟悉，于是便深受樊耀南挽救新疆的民族平等、整理财政、铲除贪污、发展教育和整顿军队等五项主张所鼓舞。樊耀南也的确抓住了新疆当时面临的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包尔汉也参与办了一份发行100份的《新生活》刊物，用以响应樊耀南的寻求新疆未来的积极探索，然而《新生活》也仅出了两期，便因惧怕官府管制而夭折。

民国二十三年（1925年）上半年，驻迪化华俄道胜银行经理苏沃洛夫向杨增新赠送了一辆美制小轿车。杨增新乘坐着小轿车出游，甚感方便，遂生出兴办汽车运输的念头。不久，杨增新便委托包尔汉任汽车公司委员兼司机学校校长，并将那部小轿车送给包尔汉做教练车，意在培训汽车驾驶员，并筹备汽车公司。

民国二十四年（1926年），汽车公司筹备就绪，包尔汉就任汽车公司局长。新疆汽车局当时设在老满城的鼓楼东侧，包尔汉报请杨增新同意后，开始修建房舍、车场，并派人从美国驻天津领事馆购买了15辆道奇汽车，开始了新疆汽车运输的历史。此后，为了汽车运营，包尔汉又从苏俄和天津聘来了维修技术人员，开展了汽车维修业务，并筹划南北疆的公路筑路计划。当年包尔汉年仅32岁。

然而修筑公路是个非常花钱的事，包尔汉几次找杨增新谈过几次，均因为耗资巨大，财政困难，难以落实。包尔汉又找到实业厅长阎毓善、财政厅长潘震诉说此事，无奈他们全部惟杨增新马首是瞻，没有杨增新的指令，他们不可能有什么主张。

民国二十六年（1926年）2月，由瑞典斯文·赫定与徐旭生率领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抵达迪化，包尔汉负责具体接待。后来徐旭生在日记中说：“包君俄文甚好，回族（此处的回族系指维吾尔族）一方面的事业清楚，对汉文也颇能写能看，实为难得之才。最令我诧异的是，他手里居然有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西北考察团来到迪化后，斯文·赫定与徐旭生拜会了省长杨增新，再次谈到了新疆兴办汽车运输，必须修筑公路的事，而修筑公路，则必须需要购买筑路机。这一次，杨增新倒是很爽快地答应斯文·赫定说：“新疆马上就要修筑公路了！”还请斯文·赫定代为购买筑路机，另外再从瑞



典购买 15 辆汽车。没过几天，购买筑路机的款项便拨了下来，并动用军队的力量来修筑吐鲁番到迪化的公路。

7 月初，杨增新突然将包尔汉找来告诉他说：考察团的医生郝默尔准备去天池一趟，需要你陪着去一趟！7 月 6 日一大早，包尔汉去见杨增新，请杨同去天池。然而杨增新临时改变了计划，让包尔汉赶回吐鲁番，看公路修的怎样了。7 月 7 日，包尔汉一路查看修路情况，当天夜里赶到了吐鲁番。他办完公事，在返回迪化的途中，得知省城发生政变，杨增新被杀！

吐鲁番到迪化的公路修建，名义上动用了两个营的兵力，但实际上仅有三四五十名士兵在劳作。杨增新大骂这些人冒领空饷非常可恶，而命包尔汉去核查公路修筑情况。仅仅几天时间，新疆两大巨头双双殒命，让包尔汉心乱如麻。

杨增新死后，金树仁因为平乱有功，窃取了新疆军政大权。尽管金树仁对包尔汉并不信任，但因为也没有什么把柄，只得将包尔汉支开。一天，金树仁找到包尔汉，让其到德国去采购压路机等设备，同时考察外界的实业情况，时间是三个月，考察后为省府提出实业发展计划。1929 年 9 月，包尔汉离开新疆经莫斯科到了德国。

四、羁縻柏林，宣慰阿山，入狱两年

在德国柏林，包尔汉通过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介绍，采购了 6 部压路机运回修建，又应金树仁的要求，购买了 200 支短枪发回新疆。包尔汉请示金树仁可否回国，金树仁没有丝毫反映，也没有让包尔汉回国的任何指示，6 个月后，1930 年秋天，包尔汉考入柏林大学经济学习。

1932 年 12 月，包尔汉离开新疆已经三年。经包尔汉再三请求，他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但包尔汉才回国两个月，金树仁便以新的理由让包尔汉再次离开新疆赴德国。当包尔汉再次返回新疆时，金树仁已经垮台，郁郁东去。

1933 年 5 月，包尔汉在莫斯科得到新疆的消息：新疆“四·一二政变”发生，金树仁被驱赶下台，盛世才攫取新疆军政大权。此时马仲英部窜入新疆，其马赫英、马如龙部围攻塔城、阿山。回到新疆的包尔汉立刻接受了省府任命其担任阿山宣慰使，奔赴阿山，安抚地方。

10 月，包尔汉游说阿山各界人士，筹备成立了一支武装，迫使马赫英部撤离阿山。随后，包尔汉又在塔城招募组建了归化旅团，协助塔城政府军解除了伊犁屯垦使张培元在塔城的武装。其后又从苏联购进了一些面粉，救济难民，终于使马仲英、马赫英煽惑起来的牧民全部归牧，阿山也重又归于平静。

1934 年，包尔汉完成阿山宣慰任务后，返回迪化。盛世才非常满意包尔汉在阿山的宣慰工作，又任命包尔汉担任了裕新土产公司总经理，同时兼任新疆反帝总会民众部副部长的职务。

当时新疆与苏联的贸易正呈上升趋势，包尔汉组织新疆的土特产品对苏出口，换回了大量外汇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发展了新疆的经济。为消除省府与牧区牧民之间的隔阂，包尔汉还组织商家以裕新土产公司的名义组成商队，到牧区用货物交换陶模的土特产品，同时还借机宣传政府的政策，缓和了牧民与省政府间的关系。在包尔汉的操作下，新疆相关部门成立了临时的市场总委员会，在巴里坤、木垒等牧区成立分会，通过减轻税率、调拨资金和货物的办法，既解决了牧区牧民的生活困难，也极大缓解了那里的社会矛盾，使社会秩序得到恢复和稳定。

这一时期，包尔汉根据盛世才的指示，以裕新土产公司的名义，全权完成了与苏联商务代表签订了两笔贷款合同：一笔是 1935 年 8 月签订的贷款 500 万金卢布合同；一笔是 1937 年 1 月签订的贷款 250 万金卢布的贷款合同。所有贷款合同，均由包尔汉奉命在借约上签字。

工作之余，因兼着新疆反帝总会的民众部副部长职务，包尔汉与反帝会的秘书长俞秀松结下了革命情谊。1936 年 7 月，俞秀松与盛世才的小妹盛世同结婚，包尔汉与夫人拉希达一同参加



了他们的婚礼。包尔汉的夫人拉希达是盛世同就读的女子师范学校的维吾尔文老师，这种特殊关系，使她们的情谊也与日俱增。

1937年5月，包尔汉被任命为中国驻斋桑领事馆领事。临行前，包尔汉与俞秀松依依惜别，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之间的永别。不久，俞秀松便因“托派”问题被逮捕入狱，押往苏联。

1938年2月，包尔汉接到盛世才命令其回国述职的电报。在返回迪化途径精河时，一辆小车拦住了包尔汉所乘坐的货车。几名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下车将包尔汉拘押，押往伊犁。包尔汉认出来，指挥抓他的人是苏联人。他在中国新疆，竟然是被苏联人逮捕了起来。

包尔汉最先拘押在伊犁，4月12日被押送到乌鲁木齐第二监狱。公安管理处处长李英奇和两名苏联陪审员开始审讯包尔汉，他们给包尔汉安的罪名是“里通外国，妄想依靠德国和日本的势力在新疆搞独立的回教国，让新疆脱离中国版图。”包尔汉一字一顿地说：“我一向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我曾在塔城揭发过德国特务伊什尔特，将其交给了苏联；我同样痛恨日本帝国主义，1933年在任阿山宣慰使时，我亲自带兵与日本的走狗马赫英打过仗，揭穿过他们打着伊斯兰旗号，妄图建立回教国的阴谋……”

包尔汉据理一条一条反驳给自己强加的各项罪名，审讯人员“于是，给我加上重刑，强迫我跪倒碎砖头堆上，还要高举双手，搞得我昏死过去两次。”

包尔汉的反驳反而招致更严酷的刑罚。“有一次，竟让包尔汉高举双手连续站立21个昼夜，折磨得死去活来。”这种审讯持续了两年时间。1939年11月底，盛世才又将包尔汉关进单人黑牢达68天。

然而监狱的黑牢却又催生了包尔汉心中的革命之火。包尔汉没有气馁，没有彷徨，又开始了他对《维汉俄词典》的编纂工作。

1940年春，包尔汉被转到了第四监狱，狱方想利用他的特长为他们翻译资料。由此，包尔汉的监狱生活有所改善。不仅他的居住环境，就连伙食都有了很大改善。公安管理处送来了一大批维、汉、俄、德信札和资料，还有一些书籍，其中包括盛世才写给斯大林的信，还有一些案情报告交给包尔汉翻译。包尔汉利用这些机会，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一书全部译成了维文，同时还将以前编写的《维汉俄辞典》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于1944年完成了初稿。

五、赴南京政府过度“镀金”

1944年9月11日，盛世才灰溜溜的离开新疆，前往重庆就任中华民国政府农林部长职务。吴忠信接替新疆省主席。1944年11月28日，包尔汉获释出狱。而在包尔汉出狱半个月前的11月12日，伊犁暴民在苏联唆使、参与下在新疆伊宁市发动武装叛乱，并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包尔汉出狱后，经过治疗，身体逐渐恢复。1945年，包尔汉仍被派到警务处任翻译室主任。正当他为此而苦恼时，民政厅长邓海翔找到他，请他出任民政厅副厅长。

包尔汉到任后，看到很多少数民族青年失业，便萌生了将这些人组织起来，择优加以培训，毕业后服务于社会。邓海翔将包尔汉的想法汇报给吴忠信以后获得支持，包尔汉便择优选拔了40余名青年加以培训，吴忠信还参加了开学典礼并讲了话。然而开学没有几天，包尔汉便被任命为迪化区督察专员，离开了培训班。包尔汉后来得知，原来是警务处翻译室的副主任阿克拜尔举报，说包尔汉开办培训班是为了给“三区”方面培训骨干，所以包尔汉被调离了培训班。

迪化区督查专员是个有明无实的闲差，包尔汉整日无所事事，遂开始关注起时事来。此时，“三区”方面正分兵三路人马向新疆其他地区扩展势力，天山南北处处是战火纷飞。其中的中路民族军一举向迪化杀来，严重动摇了国民党在新疆的统治基础。



鉴于包尔汉当时的处境、地位及影响，苏联驻迪化领事馆找到包尔汉希望探明其对伊犁方面新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的态度。包尔汉怒不可遏的回答说：“过去你们指使盛世才关押我，说我是德国间谍，阴谋在新疆搞‘独立’，可是你们现在却实实在在支持一些人在新疆搞独立，分裂中国领土，还问我的看法！”

苏联领事叶夫谢耶夫对包尔汉的质问，无言置否。包尔汉自然从心里十分清楚了，伊犁方面实际就是苏联人在背后在搞鬼。

吴忠信主政新疆后，几乎将所有精力都用在了应付“伊犁事变”了，计谋用尽，绞尽脑汁，可新疆局势依然动荡不安。吴忠信感到无能为力，只好呼吁中央再派大员来新疆谋求和平谈判，自己乘机隐退。

1945年10月，张治中率领代表团抵达迪化，与伊犁方面进行和平谈判。通过艰苦谈判，双方终于在1946年1月2日正式达成《十一项和平条款》，伊犁方面也取消了“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的称谓。

为庆祝《和平条款》的签字，新疆政府在西大楼举行小型文艺晚会，包尔汉也应邀参加。1946年6月，“和平条款”的第二个附件签署后，新疆成立了由各方代表形成的省联合政府，阿合买提江和包尔汉同时担任省联合政府副主席。

1947年5月，主政新疆的张治中辞去了兼任的新疆省主席职务，任命原新疆监察使麦斯武德任新疆省主席。麦斯武德上任后，又推荐了与其关系密切的伊敏和艾沙分别担任了副主席和政府秘书长，包尔汉调往南京任国府委员。麦斯武德是个老牌的泛突厥主义分子，在杨增新执政时期，就因在伊犁开办学堂，大肆宣传泛突厥主义而被杨增新关押。麦斯武德出狱后，长期居留内地，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重视。随着国民党势力进入新疆，麦斯武德也得以衣锦还乡。

麦斯武德不仅是个泛突厥主义者，还是个反苏、反共主义者，由其出任新疆省主席，激起“三区”方面的强烈反弹。

张治中后来找到包尔汉，告诉他要去南京任政府委员。这样，对于以后再任职会非常有利，也可以满足“三区”方面的要求。1947年9月，包尔汉飞赴南京任职。1948年5月1日，国民政府召开行宪大会，包尔汉改任总统府顾问。因为无事可做，包尔汉遂赶回迪化。也因包尔汉在任新疆政府副主席时，同时兼着新疆学院院长的职务，在其到南京任职后，这个职务仍然兼任，所以包尔汉便把精力放在了新疆学院的管理上了。

新疆省政府的伊敏利用各种场合，大肆宣传“‘东突厥斯坦’一万年来就是维吾尔人的故乡。所以在‘东突厥斯坦’，只有维吾尔人才有做主人的权力……”。包尔汉了解到这些后，感到这分明是赤裸裸的分裂祖国的行径，不能听之任之。包尔汉与涂治商量后，召开全体师生大会，以院长的身份公开批驳伊敏的荒谬言论及其阴谋。包尔汉还以其渊博的知识，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地讲述新疆两千多年来的丰富历史说：“新疆不是一个民族的新疆，而是各民族的新疆。正如中国不是一个民族的中国，而是各民族的中国一样。如果说新疆只是维吾尔一个民族的话，在新疆范围来说就犯了大民族主义的错误；在全国就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即狭隘民族主义的错误……”。

六、出任新疆省主席

1948年底，通过张治中的努力，国民党中央决定任命包尔汉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得知后，心里非常激动。他真心希望能够团结各方面人士，让自己成为混乱年代的最后一任新疆省主席。

1949年1月10日，包尔汉正式出任新疆省主席。包尔汉经过深思熟虑后，发表《告全疆民众书》，阐明了自己的施政方针：尽最大努力继续执行联合政府时期的和平条款，维护合谈成果，



填平与伊犁政府方面的鸿沟，让各族人民在和平道路上安稳地生活。《告全疆民众书》当中只字未提蒋介石，更没有提到伊敏等人。

包尔汉接手的是麦斯武德留下的一个烂摊子，处处是千疮百孔。尤其是经济已处于崩溃边缘。在迪化的国民党军政官员眼看大势已去，以金圆券大肆抢购商品，一股更大的抢购风潮蔓延全疆。情势危急，稍有不慎，便会酿成社会动荡。如何才能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安抚人心？包尔汉苦思冥想，终于想出办法，可以发行新疆地方货币——银元票，来避免金圆券对新疆经济造成的冲击。

1949年2月6日，包尔汉奉张治中之命飞赴兰州，参加西北甘、青、新三省军政首脑会议。

包尔汉向张治中详细汇报了新疆的情况、面临的形势，以及发行银元票的设想。张治中听完汇报，沉吟片刻，缓缓地说：“新疆地处偏远，各族人民生活困苦。由于我考虑失策，让麦斯武德给你添了不少麻烦，都是我用人失察的结果。经济形势的糜烂，非独新疆一家。只要能渡过危机，对老百姓有所补益，经济方面你们采取什么措施我都同意。”

包尔汉赶忙接话说：新疆局面的危艰，只能怪麦斯武德没有能忠实执行十一项和平条款和施政纲领。张治中向包尔汉建议说，挽救新疆经济形势，仅靠发行新货币还不够，赶快把土产公司恢复起来，扩大出口规模，用换回的物资调剂市场，控制物价。另外，新疆方面的关税就不用上缴了，留在新疆，缓解燃眉之急吧！包尔汉又接着张治中的话，试探着说：“可否将新疆存放在中央银行的五万五千两黄金调回新疆，可就解决了新疆的难题啦！”张治中面露难色地说，我想想办法吧！

回到迪化后，包尔汉按照张治中的意图，尽最大努力在新疆维护和平。由于得到张治中的支持，包尔汉着手布置改革货币事宜。他将议案提交省府讨论，决定发行新疆银元票，取代金圆券在新疆境内的流通。1949年5月20日，新疆银元票开始上市发行流通。新疆物价暂时得到了抑制，民心也渐渐趋于稳定。

正当新疆新货币发行平稳进行时，国民党中央政府用专机运来了大批金圆券，用以支付国民党驻新人员的薪酬。包尔汉一时手足无措，担心这批金圆券一旦投放市场，必将如洪水猛兽冲击新疆市场，使刚刚建立起来的政府信用一败涂地。包尔汉紧急召集政府委员会会议，当即命令白文煜副厅长以财政厅名义电告中央银行：各机关军政费用请用银元票拨付。

中央银行收到电报后，非常不满。运送金圆券的专机停留哈密两天后，只得将金圆券原封运回。金圆券退回去了，新疆经济也躲过了一劫。但到了1949年8月以后，金圆券又从其他途径潮水般入新疆。兰州解放前夕，大批在兰州做官、经商的新疆人为躲避战乱纷纷返回新疆，带回大量金圆券在新疆进行抢购，并且放出新疆马上就要打仗的消息。这使得新疆的形势又空前紧张起来，银元票再次面临抢购风潮的猛烈冲击。

这时，新疆工商界头面人物找到包尔汉，建议抵制金圆券进入新疆。包尔汉不可置否地说：“我是新疆省主席，怎能与中央分庭抗礼？”包尔汉遂即电告侍从室主任聂立夫，让其转告中共地下组织，配合抵制金圆券在新疆的流通。很快，迪化市商会颁布了抵制金圆券在新疆流通的公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玛纳斯、呼图壁、昌吉又传来“三区”民族军欲进攻迪化的消息。8月8日，包尔汉紧急找来教育厅副厅长陈方伯、秘书处的努斯热提和省保安司令部的王润三人代表省政府前往玛纳斯前线，与民族军方面进行谈判，以和平为重，绝不率先用兵。

1949年9月，中共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取得决定性胜利。西北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一军、第二军解放了西宁。王恩茂、郭鹏率领的第二军在解放西宁后，迅速向新疆开进。

包尔汉决心带领新疆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当他把自己的想法与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沟通时，没有想到他们二人不谋而合，均打算率部走和平起义的道路。



正当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内部的拥护和平起义派与反对和平起义的一派斗争异常尖锐之时，包尔汉得到了中共中央的特派联络员邓力群来到迪化的消息。

9月16日上午，邓力群在包尔汉的寓所首次与陶峙岳、包尔汉商谈新疆和平起义的相关细节问题。会谈结束后，邓力群转交了9月10日张治中给他们二人的电报：

迪化陶副长官岷毓兄、包主席尔汗兄：

自接辰真电后，以西北人事更动，又因时机未至，故未再通讯。治于6月26日发表声明，由北平新华社播出，谅已接悉。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治深知毛主席对新疆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满意之处理。治已应邀参加即将召开之新政协会议，并承毛主席面商希望治返新一行。当允如有必要，愿听吩咐。甚望兄等当机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取严密部署，果敢行动，则保全者多，所贡献者亦大。至对各军师长或有关军政干部，如有必要，盼用治名义代拟电文，使皆了解接受。绍周、孟纯、经文诸同志均致意。兄意如何？盼急电复。

张治中

张治中的电报让他们二人吃了一颗定心丸。包尔汉更是顿感欣慰，因为自2月在兰州与张治中见面后，自己一直致力于新疆和平，怎奈新疆局势复杂，心理压力极大，如今新疆各族得到张将军的指示，并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注，新疆和平起义也就指日可待了。9月19日，包尔汉通过邓力群向毛泽东致电：

毛主席：

解放军胜利完成人民解放伟大事业，谨致无上之欣祝。此间对新民主主义及尊重少数民族利益之号召，早有坚强之信心及拥护之赤诚，并为之克服困难。经决意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兹已准备一切力量消灭反动势力，接受领导，俾每一角落，共庆新生，以完成钧座所领导的整个中国之解放。特电敬布衷忱，敬祈亮鉴。

包尔汉 申皓叩

四天后，包尔汉便收到了由邓力群转交的毛泽东的回电：

包主席：

申皓电悉，极感盛意。新疆局面的转变及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鼎力促成。尚望联络各方爱国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入新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特此步履，敬颂勋祺。

毛泽东 申梗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包尔汉心潮澎湃。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包尔汉与陶峙岳共同商议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的暴乱阴谋，迫使他们“和平撤退”。为了减少阻力，包尔汉在财政拮据的省库里拿出巨额资金，购买了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人的宅院、汽车等各项私产，迫使他们交出兵权。

9月24日，陶峙岳通过刘孟纯同包尔汉商议，由军方率先宣布和平起义，以定军心。

9月25日，陶峙岳率部通电起义。

9月26日一早，包尔汉率领新疆省政府通电起义，断绝与广州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关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宣布起义之日起，机关工作人员和各族人民要切实保护好文物、档案和一切公共财物，维护正常秩序，不得干扰社会秩序，破坏社会治安。

9月27日，新疆省政府在西大楼前的广场召开庆祝和平解放大会，并向全国各地发出通电。

9月28日，包尔汉再次致电毛泽东：



毛主席：

申梗电奉悉。瞩望殷切，深感雅爱。此间已于申宥正式宣布与广州反动政府脱离关系，接受北平中央人民政府一切领导。当时群情兴奋，欢腾达晚，是徵人心所趋，无分民族。但转变伊始，一切均感茫然，敬恳多加指示，俾使遵循。再邓力群同志与尔汉相处甚得，一切均就近商酌办理。敬电布闻，敬祝健康。

包尔汉 申俭

同日，毛泽东、朱德总司令给包尔汉、陶峙岳将军及新疆军政界起义人员发来电报，对和平起义表示嘉勉：

你们在9月25日及26日的通电收到了，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甚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正准备进疆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的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

看着电报，包尔汉心里万分激动。新疆的苦难岁月就要过去，光明已经降临，自己为之奋斗的新疆和平终于到来。

10月1日，北京传来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的消息。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第二天，全市各族人民又来到广场集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包尔汉在庆祝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新疆通电和平起义后，人民解放军暂未抵达新疆，起义部队中的少数顽固派依然在兴风作浪。他们散布说：“陶峙岳怕被人刺杀，已经坐飞机跑了！包尔汉已经隐居起来了”等等。而包尔汉自参加国庆集会后就病倒了，但他强忍着病痛，责成起草并大量印发了《告起义将士书》，一边赞扬他们的起义行为，一边号召社会各界慰问起义将士，以稳定军心。随后，包尔汉再次以省临时政府的名义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发去电报，报告新疆形势：

“本省情势严重，务希转饬西来之人民解放军兼程来新，以解危局，并慰人民之热望。”

得知人民解放军正从酒泉进军新疆的消息，包尔汉立即派迪化市市长屈武和哈生木江率省临时政府代表团到酒泉一野总部，迎接人民解放军火速进疆。同时，包尔汉派自己的儿子努斯热提到新疆的东大门——哈密，欢迎解放军进疆。

1949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战车团进入迪化，包尔汉带领人员乘车赶赴乌拉泊欢迎战车团进入新疆。当战车团进入迪化市区时，欢呼声震天动地，鼓乐声响彻云霄。

12月7日，王震、徐立清、辛兰亭、贾拓夫、高纯棉等先后乘飞机到达迪化，包尔汉、陶峙岳等亲自到机场迎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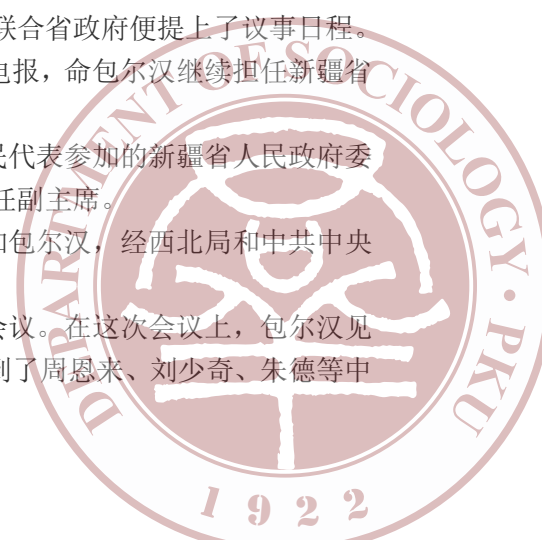
12月9日上午，包尔汉陪同彭德怀、张治中在迪化南大街商业银行大楼的阳台上检阅三军入城式，陪同检阅的还有王震、陶峙岳、刘孟纯、赛福鼎、屈武、陶晋初等。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进驻并与“三区”民族军会师，成立民族联合省政府便提上了议事日程。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包尔汉就收到了中共中央发来的电报，命包尔汉继续担任新疆省政府主席。

12月17日，经过政务院第11次例会批准，由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参加的新疆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成立。包尔汉任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高纯棉、赛福鼎任副主席。

1949年12月31日，包尔汉被请到王震的办公室。王震告知包尔汉，经西北局和中共中央批准决定，他不经候补破格接纳其为中共正式党员。

1950年5月，组织通知包尔汉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包尔汉见到了日思夜想的毛泽东主席。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包尔汉不经见到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



央领导，而且由周恩来陪同去刘少奇家里做客。刘少奇向包尔汉强调，在新疆应该搞好民族团结。

在新疆实行民主改革的时候，包尔汉积极参与和支持在新疆进行的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和消灭封建所有制的各项改革。在这一时期，包尔汉还挤出时间，翻译介绍了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和蒙古共和国社会改革的资料，供王震参考。

七、服从大局，任职中央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前夕，中央决定由赛福鼎·艾则孜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调包尔汉到北疆工作。1955年2月，周恩来电邀包尔汉到北京。

1955年10月后，包尔汉来到北京，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随着地位的提高，包尔汉所兼职的荣誉也越来越多。在“文化大革命”前后十年当中，包尔汉出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还先后担任了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委员、中国伊斯兰协会会长、中国印尼友好协会会长、中国阿联友好协会会长、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等10多个机构和团体的重要职务，曾出访过亚、非、欧十几个国家，多次参加国际和平会议。在对外交往活动中，他始终坚持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热情宣传了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促进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

1966年8月，包尔汉的家门口出现了“打倒包尔汉”的大字报和标语。1966年9月2日，包尔汉被遣送回新疆继续接受批斗。1967年底，包尔汉被捕入狱。在狱中，包尔汉一关就是八年。而此时的包尔汉，已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

1975年，疾病缠身的包尔汉获准出狱，但仍以“苏修间谍”的罪名交由群众监督改造。直到1977年11月，包尔汉才落实政策，返回北京。

1978年，在全国第三届政协会议上，包尔汉再次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79年，包尔汉重新梳理新疆、中亚及西亚的历史地理资料，完成了《关于新疆历史的若干问题》的学术论文撰写。1982年，包尔汉又发表了《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新疆的兴灭》一文。

此后，包尔汉以年近90岁的高龄，进行《新疆五十年》回忆录的撰写工作。

包尔汉一生倡导民族团结，共有8个子女。子女及下一代中分别与维吾尔族、哈萨克、塔塔尔、乌兹别克和汉族青年结婚，是一个典型的五个民族的大家庭。

1989年2月，95岁的包尔汉因病在北京住院。有感于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他口述了遗言-----《留给孩子们的话》，其中这样写道：

“我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劳动人民家庭，我的生活道路是从商店做学徒、店员开始的。勤劳和节俭是我一生奉行的准则。你们永远不要沾染任何‘贵族’习气，要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克勤节俭，艰苦奋斗，做人民中的普通一员。我的一生都靠工资为生，从没有为个人积聚过财产。在我身后，我能给你们留下的不是什么物质财富，而是对你们最殷切的希望，希望你们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

自从1912年我从国外返回祖国，至今已近80年了。在这80年的时间里，我经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经历了无数的人生坎坷。为了寻求真理和正义，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曾在黑暗中摸索，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确立了我终生为之奋斗的生活信念。正是这种信念，支持我度过了无数艰难困苦。我希望你们在今后的生活中，要坚毅、顽强，百折不挠、克勤克俭、艰苦奋斗、正直善良，友好团结，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1989年8月27日，包尔汉走完了95岁的辉煌灿烂的一生。其遗体安葬于乌鲁木齐南郊的乌鲁木齐革命烈士陵园。

2018年5月2日

